

# 現代棒球的跨國傳佈\*

——一個「運動化」的歷史社會學詮釋

邱建章\*\*

##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現代棒球從大英帝國跨國傳佈的發展過程，以及臺灣社會接合「運動化」進程時所形構而成的文化樣態，藉此理解現代棒球對在地運動的影響。並以「歷史社會學」的視野，利用既有的歷史與文獻資料，探究現代棒球跨國傳佈的歷程，理出其中的主導因素及其脈絡秩序下的文化意義。結果發現：1.現代棒球是從英式板球／跑柱式棒球跨國傳佈進而逐漸轉型為美國現代棒球及日本野球，並在殖民勢力的推波下造就臺灣棒球的文明體驗，是一個文明相互競爭所構築形成的全球運動體系；2.在地社會的現況則為：美國正以其強大的「軟實力」造就一個全球運動高度流動的現象，其中包含競技勞工外流、商品消費、媒體影像以及主流的運動生活方式等四個層面的不平衡流動，呈顯出全球／在地的動態互動與交錯影響的具體後果，在地社會漸趨「美國化」且非「利大於弊」的現實發展，使得現代棒球傳佈與接合的進程中，激起在地運動的批判性反思，意圖應對由此衍生而出的文化與經濟問題。

**關鍵詞：**全球化、運動化、美國化、接合、歷史社會學

---

\*本文受惠於行政院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運動與身體文化：全球化下台灣運動文化的發展與實踐」(NSC100-2410-H-259-063-)之經費補助，並為此計劃之部分成果。作者特別感謝本刊兩位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以及臺灣師大湯添進所長的鼓勵與提攜。

\*\*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副教授，ivanis1976@yahoo.com.tw。

##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modern baseball: A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on sportization**

*Chien-Chang Chiu* \*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modern baseball from United Kingdom to the whole world and to analyze how the process of sportiz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impact of the subjective value on local sports when it articulates with Taiwan's society. The study is carried out by applying qualitative method such as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literature review to understand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of modern baseball, clarifying the dominant factors and the cultural meaning in the contextual order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The findings show that modern baseball was transformed from British rounders into American Baseball and Japanese *yakyu*. With Japanese colonial power, it was introduced to Taiwan, which hence contributed to Taiwan's baseball cultur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having a great "soft power" over worldwide local societies,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current phenomenon of the intense flow in global sport system. Such unbalanced flow has four main impacts on Taiwan society, including the drain of high-end athletic elites, the domination of western sporting commodities subcontractor, the popularity of foreign media images and the mainstreaming of American sporting lifestyle in local society. It has resulted in a complex consequence of mutual dependent influence under the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a tendency of Americanization. Given that the advantages outweigh

---

\*Chien-Chang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 Kinesiology,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the disadvantages, many societies begin to criticize and reflect on rebuilding their own sport communit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Sportization, Americanization, Articulation, Historical Sociology

## 一、緒論

今天位處世界任何一處，如果抗拒以西方的運動項目來動態地表達身體文化，幾乎是一件難以達成的任務。舉例來說，日常生活一旦抽離現代籃球、排球、足球、棒球等內容，即可想像運動場上所將呈現的單調模樣，這樣的文化想像也透露出當今全球化的世界裡，原本遙遠萬里外的西方運動文化早已對在地社會產生無可比擬的作用力，並滲透進臺灣運動文化的各個方面。

回顧現代運動的歷史與社會進程，「現代性」的元素及條件緊密鑲嵌其中，促使運動成為深具影響力的文化載體，建構出「運動化」的全球進程，Maguire 則將此一進程界定為：從英國茁生出來的休閒娛樂逐漸轉型成現代運動的形式後，這些現代運動進一步輸出、傳佈至全世界的過程（Maguire, 1999:37）。由於「運動化」的進程深刻影響在地社會的文化樣態，因此值得爬梳具體脈絡，藉此理解過去、反思現在，乃至收取展望未來之效。

但，現代運動發展至今，已是多元紛呈的複雜結構，有必要聚焦才能進行較為系統的脈絡分析。據此，本文選擇以「現代棒球」為例，原因在於棒球運動是臺灣在地社會連結全球運動文化較深遠、歷史脈絡較清晰、社會關注度極高、議題討論廣泛，且所遺留的歷史社會論述最為豐富的一項在地運動實踐。更如 Morris 所強調的：「要理解臺灣現代棒球史就必須深刻關照全球 / 在地之間的交互影響、適應調和以及慾望展現的模式」

（Morris, 2006:5）。職是之故，本文將以「歷史社會學」的視野，探究「英國愛爾蘭跑柱式棒球」（rounders）如何進一步傳佈、轉型成「美國棒球」（baseball）、「日本野球」（yakyu）（為突顯美國棒球傳佈的多元路徑，將

再與加勒比海棒球運動進行路徑比較)，並接合形塑成「臺灣國球」的過程，探究這項「球類遊戲」如何從歐陸跨越疆界，進而制度化為一項具有全球政經文化影響力競技運動，藉此突出全球化進程中，「運動化」的重要轉型契機，其中特定人員的活動、時空分佈與組織機構的發展是如何形成一條特定的歷史線索，勾勒出現代棒球的變化過程以及隨著時間所體現的影響。

社會學家 Elias 嘗言：缺乏全球過程和社會變遷的參照框架，就無法充分而適當地診斷、詮釋當下的社會現象 (Elias, 1991:163)。職是之故，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究現代棒球從大英帝國跨國傳佈的發展過程，以及臺灣社會「接合」「運動化」的歷程時所形構出來的文化樣態，藉此理解現代棒球對在地運動主體價值的影響。進而言之，將藉由具體的歷史事實及社會脈絡來檢視東西方運動文化的交流、接合與交互影響，並透過歷史社會學的視野認識主導變遷的因素及其軌跡，理出其中的脈絡秩序與文化意義。而在論及「接合」時，Slack 提醒我們有必要認識到：接合或組合所形成的統一體，必然是一個「複雜結構」。在這種結構中，事物透過彼此的相似與差異而產生關聯，其各部位就會有結構化的「支配與從屬關係」(王志弘、李根芳，2003：18)。此一具有理論意涵的概念當可作為反思現代棒球接合在地社會時的重要分析工具。

Maguire 提醒我們，全球化進程是各種有意圖的意識型態實踐和非計畫性的相互依賴關係之間的平衡或調合所建構而成的 (Maguire, Jarvie, Mansfield & Bradley, 2002:8)。基於運動全球化所形成的複雜爭論，加入這場理論遊戲的典範就顯得龐雜分歧。像是現代化理論、型態 (figurational) 社會學、(文化) 帝國主義理論、依賴理論、世界體系理論、文化霸權理論、後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以及全球化研究 (Maguire, 2000; Maguire, 1999; Horne, 1998; Jarvie & Maguire, 1994)，都是重要的典範，其中的型態社會學則值得多做說明。文明化理論家 Elias 曾將型態界定為：

「人們相互依賴的網絡以及長時段內 (long-term) 不斷變化的關係 0。」他強調要考察由許多個人「互動」所形成的社會，而運動常被他用來比喻人與人之間具體存在的網絡以及不斷延續、變遷的可能性。在其理論脈絡中，如在運動場上相互依賴的人們所形成的活動型態，可使人更輕易地想像國家、城市、家庭以及整個社會系統都是型態的表現。因此 Elias 認為要對實質性議題（如運動全球化）進行經驗研究，才能獲得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體察 (Elias, 1994)。

因此，為了避免以過於狹隘的視野觀察全球化的過程與現象，必須保持一種更為多元且寬廣的視野來分析運動全球化的面貌。採用一種多因論、多向度的分析架構來檢視各種同質化和異質性的產物，應當可以建立一個更為適切的位置來探究全球性的文化融合 (global cultural commingling) 現象 (Maguire et al., 2002:22)。尤其，全球化的爭論常圍繞著分屬不同社群的行動者、組織乃至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以及這些競爭所帶來的認同問題與政經糾葛。也就是說，各種在地與全球之間的主客位置、強弱關係、單向度抑或是多元化發展的憂慮、辯論及其面對霸權時所持的抗拒行為也就層出不窮，影響在地運動文化的真實發展。

承上所述，本文利用既有的歷史文獻資料，探究西方的運動化對在地社會的影響，並從現代棒球的跨國接合中，理出其中的主導因素及其脈絡秩序下的文化意義，依次說明三項主文內容：(1)藉由「現代棒球的傳佈——從英式板球 / 跑柱式棒球、美國現代棒球到日本野球」，說明現代棒球萌芽期與開端期的重要傳佈路徑與主導因素；(2)再以「野球到臺灣——臺灣棒球的文明體驗」，分析文化全球化中成長期、霸權爭鬥期及不確定期的進程中，現代棒球與在地社會接合的境況；(3)最後提出「結語：現代棒球的傳佈與接合——在地運動的批判性反思」，藉以總結本文所提出的問題意識與核心旨趣。

## 二、現代棒球的傳佈——從英式板球／跑柱式棒球、 美國現代棒球到日本野球

文化全球化論者 Robertson 認為現在所討論的全球化概念，是行之已久的過程，雖略有中斷，但已延續數個世紀 (Robertson, 1992)。他並堅稱全球化過程不是新的現象，它在現代性與資本主義興起之前就已存在，不過現代化傾向「加速」全球化的發展。此外，歐洲則是這波發展的起源與核心地區，並以五個連續的階段簡要地勾勒「文化全球化」的歷史階段，包括：第一階段 15-18 世紀的「萌芽期 (歐洲, 1400-1750)」(germinal)；第二階段 (主要是在歐洲) 1750-1870 年代的「開端期」(incipient)；第三階段 1870-1920 年代的「成長期」(take-off)；第四階段 1920-1960 年代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霸權爭鬥期」(struggle for hegemony)；第五階段 1960 年代迄今的「不確定期」(uncertain) (Robertson, 1992:58-60)。

Maguire 則參照 Robertson 的文化全球化脈絡來觀照現代運動的進程，將現代運動 (Modern Sport) 的發展分為五個階段，並辯稱運動化的發展是此一文化全球化潮流的明證 (Maguire, 1999)。誠如 Robertson 對全球化不同階段的分期，他將第一階段 (15-18 世紀) 稱之為「萌芽期」，此一時段的歐洲社會主要發展特徵包括 (民族) 國家共同體開始嶄露頭角。「個人主義的價值」和人文主義的普遍性理想受到極力的推崇。現代地理學因地理的大發現而開始萌芽；創製出第一批世界地圖，全球的探險與殖民主義藉此開展 (Robertson, 1992:58)。而在「萌芽期」的進程裡，是西方現代運動初始創制並跨國流轉的關鍵時刻。

首先，在西方運動文化史的進程裡，中世紀宗教節日的特色之一，即經常伴隨敵對城市或行會之間「粗野」球賽的進行，這些粗野球戲是 20

世紀奇觀式競技運動——英式橄欖球、棒球、網球、足球——的前身(Elias, 1986b:130)。故此，關於現代運動的源流，史學家大都同意當前全球以大致相同的模式所進行的現代運動，多萌芽於 18 世紀的英國，並在 19 世紀下半葉、20 世紀上半葉，以各種方式流傳到其他國家而成為主流的運動項目。與此同時，英語中運動(sport)一詞也廣泛地為其他國家的文化系統所吸收，並做為此一特殊休閒娛樂(pastimes)方式的總稱(Elias, 1986b:126)。特徵是 Elias 所稱之「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他主張現代運動乃是一種新興的現象，而非僅是早期運動的延伸或復甦，並將現代運動與民族國家的建立和高度穩定及中央集權國家政體不斷控制暴力的現象連結在一起。強調前現代(pre-modern)的運動實踐較不受正式條約規範，也顯得更加暴力(Elias, 1986b)。這些運動源自於富有變化的民間遊戲，在長時間的歷史演變中不斷趨於統一的規範(Elias, 1986b:127)。並成為北美殖民地接合英式運動文化的主要核心內容。

### (一)從英式民間球戲傳佈轉型為美式職業棒球

如以現代棒球的跨國傳佈對照 Robertson 所稱之萌芽期，可從 15、16 世紀英國開始廣泛參與各項運動競賽，如早期「板球」的問世就已表露無遺。但要等到 19 世紀後半葉的英國，才確立現代運動的雛型。真正擁有正式、詳盡規則系統，同時具備全國主管機關的現代運動才告完備，接著便流傳到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國」本土(Smart, 2005:19)。如再深入仔細檢視美洲新大陸諸多風格獨特的運動項目，可以發現早期民間遊戲與現代熱門運動之間的關聯性。例如「棒球」就充分反映了舊大陸的移民者「移居」新大陸時，將舊歐洲大陸原生地的休閒娛樂帶入美洲。美國棒球起源自一項以棍擊球的遊戲，在 17 世紀時由歐洲傳入「美洲殖民地」。當前大多數人所認同的棒球前身，即是源於英國、而在美國大街小巷隨處可見的「跑柱式棒球」(張美惠，2008：20；Smart, 2005:27)。故此，許多文化



史學家認為英國跑柱式棒球和美國現代棒球有直接的傳承關係。

關於這段傳承關係，有論者認為美式棒球誕生前，18 世紀初在英屬北美洲流行的身體活動是板球，許多來自英格蘭的鄉紳地主組成板球隊比賽，各地紛紛設立了板球場。18 世紀早期少數愛爾蘭移民只好「借用板球場打愛爾蘭人偏愛的跑柱式棒球」。然而，板球和跑柱式棒球在北美洲的傳佈與區域分化，主因在於愛爾蘭曾在 1740 年發生一次大飢荒，逃往美國的愛爾蘭難民集中在波士頓和紐約等都會區。故此，愛爾蘭原本的四壘跑柱式棒球就成了美東都會區貧苦孩童在街道有限空間裡玩耍的遊戲，並被稱為「鎮球」(Townball)。到了 19 世紀初期，鎮球（類似於跑柱式棒球，並為現代棒球的前身）在人口集中的都會區獲得歡迎，波士頓地區則出現了改造板球場的麻州鎮球場（臺灣棒球維基館）。

觀諸上述現代棒球發展的考究，雖有不同版本的論述，但美國與英國關係密切，共享許多文化和生活上的傳統卻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不論是強調改良自盛行於愛爾蘭的跑柱式棒球，還是源於英國板球的關聯，都顯露出美國與英國間緊密的文化關聯（謝仕淵，2017：20）。其中，現代棒球的生成與歷史發展則說明了大英帝國殖民北美洲的同時也帶來了英國流行的民間球戲，確證現代運動的跨國傳佈與歐洲帝國的地緣政治與殖民疆界高度重疊。

#### ■現代「業餘」棒球的誕生——1846 年卡萊特創設之「燈籠褲規則」

承續英國跑柱式棒球傳佈轉型為美式棒球的過程，吾人目前所認識的「現代棒球」其實是源自於紐約市燈籠褲棒球俱樂部（Knickerbocker Baseball club）。1842 年該俱樂部在卡萊特（Alexander Joy Cartwright）的主導下創立，確保球隊擁有固定的比賽場地，並首度編訂棒球規則、提供制服。在 1845 年以前美國各地使用的規則不一，但在 1846 年卡萊特主導下制訂了 20 條規則，後人認為這是棒球比賽首次出現的「正式規則」。卡萊特在美國原是「鎮球」愛好者，自夏威夷經商回到紐約後設立了「紐約

市燈籠褲棒球隊」。這個日後被稱為「紐約球賽」、或是「燈籠褲規則」(Knickerbocker rule)的版本，奠定了現代棒球幾項重要的基礎。包括棒球取代鎮球作為正式活動名稱、鑽石造型的內野、四個壘包、九名守備員、界外球、三振、不死三振、三人出局為一半局等。1846年6月19日第一場棒球比賽在紐澤西州霍博肯市的艾莉西安球場(Elysian Field)舉行，此一球場則被視為現代棒球的誕生地(張美惠，2008：20-21；Smart, 2005:28)。

1850年代棒球剛興起時是屬於中上階層的休閒活動，但很快便擴及中下階層，棒球比賽開始從紐約地區往「四周散佈」；尤其在1861-1865年南北戰爭期間，來自紐約的北方聯軍以棒球為平日的休閒娛樂，棒球也就隨著「軍隊」的腳步踏遍美國國土，南北戰爭結束，軍人復員家鄉，也促使棒球更加流行。自從1850年代末開始興起的棒球風潮，反映出棒球比板球更能融入美國的日常生活。剛開始，那些「棒球俱樂部」極重視會員的社會地位，就和棒球所仿效的英國板球俱樂部一樣。但隨著棒球逐漸普及，「追求勝利」變得比「紳士表現」更為重要，俱樂部開始邀請來自低下階層的優秀球員加入(並提供酬勞)，棒球至此走向分裂。老派紳士想要維持棒球所代表的社會地位，因而與職業球隊區隔開來；職業球隊的白領會員成了經理人，藍領球員成了受僱者。「業餘」與「職業」棒球終於分道揚鑣(張美惠，2008：5)。

關於上述「業餘及職業之爭」，具體體現出現代運動初始發展是由受封土地的貴族與紳士階層的男性所主導，之後則由「中產階級」(middle class)擔任重塑身體文化、「競技風尚」(athletics craze)、「競賽儀式」(games cult)與履行「強身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精神的關鍵人物。因此，現代運動一直以來都是從男性的觀點來思考和策劃的，並創造出一種為「男性保留」(male preserve)的社會場域(Maguire et al., 2002:79-81)。由是之故，現代競技運動強化並發展出一種特殊形式的男性身體文化，

Bourdieu 則將這種特殊的文化傾向稱為：生存慣習 (habitus) (Bourdieu, 1984)。白人男性菁英成功地重塑新形態的身體文化，使身體文化和身體教育適應於「新教紳士」(neophyte gentleman) 的要求。因此，運動的諸多結構特質（包括它的管理、組織、控制以及實踐）都由男性所決定，且主要是為了男性而存在。而美國人與非歐裔的白種男性公民的影響力雖日益吃重，但權力與競賽的控制權仍由歐裔男性所掌控。現代運動文化的整體結構強化了一個西方取向、強健身體 (able-bodied)、且以階級為基礎的男性生存心態。此一身體文化逐漸擴散到「大英帝國正式與非正式的版圖」，並透過一系列的相互依賴鍊而與西方國家扣連在一起 (Maguire et al., 2002:14)。這意味著早期現代競技運動蘊含的道德價值、實踐方式和意義體系大都由西方男性所主導決定，而且體現出白人菁英的文化儀式、身體享樂與意識形態 (邱建章, 2007)。

當吾人探討現代運動為何逐漸成為英國社會眾多貴族菁英與仕紳階級所從事的日常活動時，須將「運動化」的過程連結到「議會政治化」(parliamentarization) 的現象，並深究 17、18 世紀當時英國的權力結構與文化之間的辯證關係。就像運動逐漸減少暴力的形式而進入文明化的過程一樣，國家議會成為各種利益衝突的象徵鬥爭場域，軍事技能逐漸讓位給與辯論有關的口語表達技巧。但卻不能直截了當地說，是由議會政治化直接導致閒暇娛樂的文明化過程。吾人可以解釋為，當議會以文明化的方式解決社會爭端時，上層社會也持同樣的生存慣習去享受並度過更為文明的休閒時光。在這個過程中，最明顯的實例即是各種被稱為「俱樂部」(club) 的自願性協會 (voluntary association) 以大規模的方式在各地創設增生 (Maguire, 1999:79-81)。顯現出運動文化存在的正當性取決於它所展示出來的道德力量與文化秩序。

而在現代棒球跨越疆界進行傳佈的同一時段，19 世紀初，歐洲也正在探討新的教育觀念。例如 1830 年，英國托瑪斯·阿諾德 (Thomas Arnold)

等教育改革者主張兒童應當身心發展並重，認為運動不僅僅是運動，更是兼顧行為正直與優越體能的典範活動，並在「公立學校」(public school)引入並採納「運動」做為固定的課外活動，從而推動英國維多利亞時期「運動的偉大發展」(張美惠，2008：18；Elias, 1986b:130)。如從運動大規模地納入學校體制的過程來看，現代運動不再只是一項消磨時光、喪失積極生產效率的休閒活動，而是轉型成為深具教育意義的身體文化，成功地在時代轉型的歷程中建立一種明確的價值觀，如公平競爭、尊重對手、努力爭勝以及恪遵守法等文明化精神。這樣的發展也為日後學校體育傳播運動文化的背景，設定了明確的制度框架。

另一個相對於現代體育課程的發展脈絡，校園之外則大量浮現對於現代運動的社會性需求。以美國為例，1850 年代之後，現代棒球開始獲得廣泛的群眾支持，眾多制度化的運動組織隨之應運而生，並從業餘模式逐漸升級為職業運動。

#### ■從業餘棒球聯盟（1858）轉型升級為職業棒球聯盟（1871）

隨著 1850 年代以來棒球在美國越來越受歡迎，社會階層的限制逐漸打破。由於棒球的步調較活潑，守備者可展現優異的本領。1850 年中期開始有「工人組隊」比賽，如布魯克林大西洋隊和紐約同好隊，就連原來的紳士球隊也逐漸「轉型」。隨著球隊間的比賽越來越公開、競爭越來越激烈，球隊開始「以球技為基準」招攬球員。過去全為白領階層的球隊開始接受工匠，甚至「非法」付錢請他們打球。伯克更指出，在 1850 年代前半期，球隊四分之三的成員是白領階級；到了後半期，變成四分之三是藍領與低階白領。隨著球隊人數增長且更加多元，「觀眾的興趣」也日益提高。球場不再是表現社交情誼的場所，而是地區與地區、種族與種族或不同職業間的競賽。到了 1858 年，大紐約地區已擁有多達 50 支成人棒球隊與 60 支青少年棒球隊（張美惠，2008：22-23）。

而在 1858 這一年，燈籠褲、高譚、帝國、老鷹等球隊的老闆，號召

大紐約市的菁英球隊齊聚一堂，結果便成立了「國家棒球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se Ball Player, NABBP)，這是美國第一個業餘棒球聯盟，共有 22 支球隊屬於該組織。但是這些棒球貴族懷抱的目的與報界的期待不同；協會創辦人的主要目標是保存他們心目中的「社會價值」與階級地位，而非推廣棒球。例如協會規定會員球隊必須至少有 18 名成員，這樣的規模才能區分球員和管理人員，並讓白領會員得以控制球隊的行政事務。此外，還規定會員行為要端正，禁止付薪水給球員（張美惠，2008：24）。

到了 1869 年，辛辛那提紅襪隊（現紅人隊的前身）的教練萊特（Harry Wright）重金從東部聘僱幾名選手，給付薪水請球員到全國各地巡迴比賽，紅襪隊因而成為「第一支職業性質的棒球隊」，萊特也被稱為美國的「職棒之父」。紅襪隊證明打棒球也可以當成職業，奠定了職業棒球的根基（何哲欣，2006：9），並在 1871 年催生第一個職棒聯盟——美國國家職業棒球員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aseball Player, NABP），但此一聯盟只維持五個球季，就因為球員頻頻跳槽、賭博、球場賣酒而宣布瓦解（謝仕淵、謝佳芬，2003：12）。

直到 1876 年，一群經理人為創造獲利更佳、更優質的比賽體系，共同成立「國家聯盟」（National League），詳細訂定職業聯盟與職業球隊的規範，目的在「控制」球員的聘僱〔球員原本可自由跳槽到出價較高的球隊，並稱為「轉隊」（revolving）制度〕。此外，國聯也對會員設限，只有少數優質球隊可以加入聯盟。這套經營模式非常成功，不僅將競爭對手一一吸收或摧毀，更成為美國運動聯盟的典型（張美惠，2008：6）。到了 1880 年代，美國各大報出現了運動版面，拜媒體科技的發展與資本擴張的動力所賜，棒球的狂熱從 19 世紀末延燒到 20 世紀。棒球成了美國名副其實的「國家娛樂」（National Pastime）（Smart, 2005:29）。

事實上，現代運動的獨特性，其實就是基於官僚體系對運動的衝擊所

形成的。官僚體系的重大功能，即是訂定並執行「共通的規範」，只要比賽的規則與標準確立，詳細界定選手應該遵循的行為模式以及球賽的場地範圍，現代運動就會因此「理性化」。運動組織即是在有意識的情況下，由正式規則所設計、命令、標準化及慣例化的機構，並將運動組織視為「理性管理」的合理化機制。地區的、國家的、乃至後來的國際主管機關紛紛成立，負責推廣、執行球賽的規則與管理辦法，確保每一種不同的比賽都擁有一貫的風貌。比賽規則與標準，統一了比賽的時間與空間環境，世界各地個人與團體之間就能在「一致的條件下」相互較勁；原本各地之間的文化差異性，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Smart, 2005:35-36; Guttmann, 1978: 47）。19 世紀中期開始，根據「制度規章」而成立的運動組織大量湧現，競賽的頻率與隊伍的數量也跟著增加，讓現代棒球的發展獲得巨大的推進力量。

這個進程與 Robertson 所指稱的全球化第二階段「開端期」(incipient) (1750-1870) 若合符節，此時社會發展強調和諧和同一性、「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興起；正式的國際外交關係逐漸形成；公民權與人類的概念不斷具體化，並首次出現國際主義與普遍主義的概念；國族主義—國際主義的議題成為議論主題，且進行國際法律的協定（Robertson, 1992:59）。由此觀之，全球文化與現代棒球的發展進程，同時興起了國際主義、跨國機構與組織規範整合的社會過程，朝向全球一體化的方向邁進。觀照上述北美現代棒球發展史，現代運動開始藉著具備理性化特質的官僚機構展開文明化、普及化的過程，過程中經歷了從「貴族紳士型棒球俱樂部」轉型為「大眾平民型棒球協會」、乃至「資本營利型職棒聯盟」。此一階段，族群移民、階級、性別、平等參與、理性化、制度化、工業化、都市化、資本獲利等元素，緊密地與現代棒球文化的發展鑲嵌在一起，有如愛侶。

而在往後銜接 1870 年代成長期的前後時段，美式棒球開始跨越國界進行大量傳佈，1873 年亞洲的日本棒球由美籍教師威爾森揭開序幕，1864

年的加勒比海古巴棒球則由留美學生古羅所開啟。職是之故，在進入現代棒球傳佈日本之前，本文將先以加勒比海棒球的初始發展，比較現代棒球傳佈的多元路徑。

## (二) 加勒比海棒球傳佈路徑的比較

當時序進入全球化發展的第三階段（1870-1920 年的「成長期」）：此時民族主義顯著擴張，現代性的問題浮上檯面，緊接著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形式的媒體通訊在速度和數量上都有顯著的成長；部分非歐洲國家晉身「文明」之列（如美國、日本），並有更多非歐洲地區加入民族國家俱樂部；也首次設置國際性競賽如「奧林匹克運動會」與諾貝爾獎項（Robertson, 1992:59）。各種國際文化交流活動高度發展，1896 年以古伯坦為首所組織創設的現代奧林匹克運動會，則是十九世紀末全球運動文化發展的里程碑與象徵性事件。

隨著美國從 19 世紀後半葉起積極向外擴張，曾受美國監管或列為保護國、附屬國的國家，如中南美洲的古巴、海地、多明尼加、波多黎各、尼加拉瓜、委內瑞拉及巴拿馬；亞洲的菲律賓、太平洋各島嶼（包括日本、南韓、臺灣等）等地，都無可避免地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也因此，與美國人最貼近的「棒球運動」，便順勢傳入這些地區而獲得當地人的喜愛。棒球會向美國南方擴展，則是因為那些國家在經濟上與文化上與美國擁有較密切的關係（張美惠，2008：80）。相反地，北美、南美洲、非洲、亞洲等區域中，凡被歐洲勢力侵入或殖民的，當地民眾最熱愛、最熟悉的運動，幾乎都是「足球」（謝仕淵、謝佳芬，2003：13）。

如以美國棒球傳佈的版圖來看，目前世界五大洲皆有棒球活動的蹤跡，但北美洲、中南美洲加勒比海以及東亞則是最為活躍的區域，如再參照日本、美國、韓國、中華台北（臺灣）、古巴、墨西哥、澳大利亞、荷蘭、委內瑞拉、加拿大、波多黎各、多明尼加等 2018 年棒球世界排名前

十二強，可以說，現代棒球的歷史社會演進說明了政經實力是各種文化傳播及擴張的有力條件與物質基礎，並且是「以美國作為核心」畫出現代棒球的地緣政治與世界版圖。本文為了論述的聚焦，選擇以「英式—美式—日式—臺式」的傳佈路徑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然而，現代棒球的傳佈並非國與國之間單一線性的流佈，而是多元的脈絡與路徑。故此，下文以加勒比海地區的發展脈絡作為比較，藉以呈現深具複雜權力模式與文明互動情境的「加勒比海棒球」。

在拉丁美洲（所有在西半球位於美國南部的國家），諸如墨西哥、中南美洲及南美洲，以及加勒比海，許多運動及休閒活動，都是在殖民帝國的影響下，正式或非正式的轉移引入（羅濤德，2012：148）。而在英國及法國勢力範圍之外的中美洲，正式及非正式的文化帝國主要是涉及美國（羅濤德，2012：152）。直言之，加勒比海區域的現代棒球傳佈是運動地理學複雜發展的重要例證，既有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的殖民勢力的駐紮，更有後來美國意圖將美式文化打進此一區域來保護、彰顯屬於美帝國的政經利益。

以鄰近美國的墨西哥而言，由於英國及歐洲的直接影響，導致墨西哥中部和西部是以足球和板球為主要運動項目。然而棒球卻風行於猶加敦半島（peninsule du Yucatan）以及北部；這個區域從十九世紀期末起，便充斥著美國的海員、工程師、礦工、鐵路工人。美國在猶加敦半島擁有許多種植園，因而在當時對棒球運動的傳佈起到促進作用。墨西哥棒球運動的成功，事實上更應歸因於地理上鄰近古巴（早期墨西哥棒球受到古巴影響甚深），其影響不僅止於運動，而且擴及到音樂及舞蹈（羅濤德，2012：152）。再沿著中南美洲地狹向南，棒球仍然是美國人在運動方面所留下的主要痕跡，尤其是在尼加拉瓜（棒球於 1888 年由美國傳教士帶入）及巴拿馬，美軍在兩國境內占領相當長的時間。在巴拿馬，若干優秀運動員都來自以英語為母語的家庭，因為就業而遷移到運河區，如棒球明星卡魯



(Rod Carew)。在哥斯大黎加，棒球首先出現在東海岸，靠近波多利蒙 (Puerto Limon)。但在內陸地區，直到今天棒球仍然微不足道 (羅潯德，2012：153)。

接著是有加勒比海棒球核心國之稱的古巴。十九世紀，古巴面臨歧路選擇：一方面是跟隨美洲大陸西班牙屬地爭取獨立，另一方面想維持與宗主國西班牙的良好關係。棒球於是成為此一鴻溝的核心，成了分裂主義者與保皇黨人的分野。棒球最早出現在島上，是由留美學生古羅 (Guillo) 於 1864 帶回古巴哈瓦那的，1874 年底 Havana 及 Matanzas 兩支隊伍的對抗賽是歷史記載的第一場比賽。1870 年代後期，先由地方俱樂部推廣，甚至達到職業手準，1878 年更成立了世界第二個職棒聯盟 (羅潯德，2012：155；Guttman, 1994:80-81)。古巴也是加勒比海棒球運動的軸心，是推廣棒球到周邊國家的關鍵力量。來自美國的行政官員、海員、商人及遊客，則提高了棒球的知名度。棒球除了它本身所代表價值觀及體能表現，同時也帶來支持獨立及民主的美國素質。但對於西班牙人而言，棒球必須加以淘汰，因為它是具有顛覆性的活動，削弱了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正當性及權威性。1895 年的古巴棒球更曾因西班牙政權的介入而遭到禁止。古巴獨立之後，棒球繼續作為古巴與美國的聯繫橋梁。起初，古巴表現出參與美國文化——推廣棒球以及讓古巴球員參加美國職棒聯賽。然而，在 1959 年以後，通過社會主義的「超級」棒球來表達對革命成功的歡欣，並開始質疑 (至少象徵性地) 美帝國主義。美國也譴責古巴隊棒球選手的設限 (羅潯德，2012：155；Guttman, 1994:83)。並時有古巴球員叛逃美國的消息傳出。

多明尼加共和國也經歷了與古巴相似的演變：美國在 19 世紀併吞多明尼加後，境內湧入美國移民，並在 1891 年由兩位在多明尼加工作的古巴兄弟 Aloma 引進棒球 (羅潯德，2012：155；Klein, 1991:6)。二十世紀開始有美軍佔領；美國支持多明尼加當地獨裁政權維護政治穩定；引進及

發展棒球，並培養多明尼加選手加入北美職業聯賽。換言之，棒球運動的發展使得多明尼加對美國更加依賴（羅濤德，2012：155-156）。因是之故，棒球促進了若干多明尼加人的經濟福祉以及民族自豪感，並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美國的支配宰制，但當地資源卻也受到更多的剝削，推而廣之便大大削弱了多明尼加的建設（羅濤德，2012：156）。對於美國職棒的依賴同時造成多明尼加棒球低度發展的文化困境（Klein, 1991:47）。

自從美國—西班牙戰爭以後，波多黎各便成為「美利堅合眾國邦聯」的一員：變成正式帝國的一部分。儘管美國人一再否認有帝國主義的意向。這種融合，使得波多黎各島民可以自由通行於美國 50 個州。因此，波多黎各接受美式棒球文化，也對籃球產生熱情（羅濤德，2012：156）。波多黎各的棒球主要是由留美學生以及 1870 年代古巴爆發十年內戰時的難民所引入。再往南，阿魯巴（Aruba）、博內爾島（Bonaire）、庫拉索島（Curacao）及荷屬安地列斯群島都產生過優秀的棒球選手。這項運動同樣影響周邊國家，如委內瑞拉及哥倫比亞（羅濤德，2012：156）。海地雖然空間上鄰近美國，但是島上的文化仍然更近法國。種族、語言及傳統等原因凌駕軍事管制，使足球在海地人眼中比棒球更重要，因此棒球愛好者非常有限（羅濤德，2012：154）。

揆諸上述加勒比海棒球的歷史，拉丁美洲是於伊比利亞帝國主義時期開始進行現代運動的傳佈。支配伊比利亞半島的各個帝國雖努力促進及掌控不同運動的傳佈，但大多數當地居民比較是以從容的狀態來選擇是否接受、拒絕或是挪用修改殖民母國的運動文化，並成為該國展現在地特色的象徵事物。但不可否認地，美國將其運動文化在海外傳佈，具有展示帝國的種族及文化優越感，其推展運動的政策，是期望以文化的方式提升被宰制臣民的文明化程度（羅濤德，2012：158-159）。由於地緣政治的因素，部分加勒比海（如古巴）棒球的發展進程更早於日本，因此，現代棒球的傳佈是以美國作為核心向外擴張世界版圖，初期是以加勒比海古巴為重

鎮，日本則是東亞社會傳佈美國現代棒球的另一個核心國度。

### (三)美國現代棒球傳佈轉型為日本野球

現代棒球確立於美洲大陸，而臺灣棒球則是經由日本這塊自命為「脫亞入歐」的新興帝國所導入的。在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棒球會從美國外傳至亞洲國家主要還有其他兩種管道，其一為「留學」美國而後歸國服務的學生，其二為美國教會駐外宣教的「傳教士」，或是到外國任教的「美籍教師」，包括朝鮮、中國大陸、日本地區的棒運皆是如此傳入當地（謝仕淵、謝佳芬，2003：13）。也就是說：跟著山姆大叔走，就能了解當今世界的棒球強權，最初與棒球接觸的那一刻（謝仕淵，2017：19）。這象徵了「國力即體力、體力即國力」的文化政經意涵，運動文化與政經權力難以劃分，期待政治與運動切割處理的信念無異於緣木求魚。

棒球傳入日本則須回顧其「開關務洋」的歷史。1853 年，美艦隊駛入江戶，要求德川幕府開放門戶。這起「黑船事件」讓日本人見識到西方國家的船堅砲利，也讓日本人民開始對幕府感到不滿。要求幕府第 15 任將軍德川慶喜交出政權。1868 年明治天皇宣布「王政復古」，下詔書把江戶改名為東京，並將年號改為明治，為 1872 年的明治維新時代拉開序幕。明治維新的目的是要學習西方國家現代文明的長處。從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朝野興起「破壞舊文物、輸入西洋文明」的思潮與行動，「棒球」這項正在美國流行的「現代運動」，便隨著這股崇尚西方文明的時代思潮進入日本（Guttman, 1994:75）。黑船事件 20 年後，1873 年一位「美籍教師」威爾森（Horace Wilson）到現在東京大學的前身——東京「開成學校」任教時，將棒球的玩法、規則教給學生，這是棒球運動最早出現在日本的紀錄。過去日本人認為太過強調身體技能是野蠻的文化表現，但是威爾森卻透過教育系統向日本學生傳達運動的重要性——「體力即國力」（Guttman, 1994:76-78）。當時開成學校的師生經常與居住於橫濱一帶的

外國人一起打棒球，不過並未組成正式的棒球組織，參與的人也僅是少數（謝仕淵、謝佳芬，2003：15）。

直至 1876 年，「赴美求學」的平剛熙回國，才為日本棒球運動打開大門。平剛熙將留學美國期間所學的棒球經驗帶回日本，1878 就職鐵道局後便積極組成日本第一支棒球隊——「新橋俱樂部棒球隊」，使得棒運有機會在日本被認識（謝仕淵，2017：23；謝仕淵、謝佳芬，2003：15），並藉著運動俱樂部的組織佈建慢慢擴大參與的社會基礎。1880 年之後，日本棒球開始「以東京為中心」逐漸向外傳佈。1883 年，日本許多學校紛紛成立棒球隊，彼此相互比賽、切磋球技。1890 年代則進入日本棒壇的「一高時代」。日本第一高等中學棒球隊創於 1886 年，初期與他校的比賽總是敗多勝少。為了求勝，一高的球員住進學校宿舍苦練（合宿制度），實力開始突飛猛進。一高棒球隊脫胎換骨後，接連擊敗多支大學與社會球隊（何哲欣，2006：16）。藉由嚴格的訓練與實戰的經驗逐漸累積競技實力，第一高等中學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棒球強權。

1891 年日本冠軍一高棒球隊（Ichiko Club）向橫濱外國人隊提出「國際比賽」的挑戰，卻遭到拒絕。橫濱隊認為日本人不具相等的社會地位，同時懷疑日本隊的體能水準。一高隊不放棄繼續提出挑戰的機會，直到 1896 年美國人才同意與日本人比賽。日本隊進場時還遭美國觀眾嘲笑，認定日人無法對抗橫濱隊。但日本隊的精湛球技讓現場鴉雀無聲，最後橫濱隊以 4 比 29 慘敗，兩週後再戰，結果仍以 9 比 32 潰敗。此一運動事件讓美國人大為震驚，日本人則因勝利而雀躍不已。此一國族競爭登上「全國新聞」而放大渲染，被視為日本人已迎頭趕上的證據（張美惠，2008：81-82）。一高棒球的勝利被視為「今日的勝利不只是我校的勝利，更是我國的勝利」，事關「國家榮譽」。在此背景下，日本的棒球與其他運動講求自由的發展並不相同，為體現「武士」精神，日本棒球具有很強的精神主義，強調勝利至上的原則（謝仕淵，2017：23）。美日棒球的國族競賽和

日本當時尋求民族尊嚴和國家認同的需要聯繫起來，棒球受歡迎程度從此勝過來自歐洲國家的板球或足球，進而成為日本的國球（Roden, 1980）。

從棒球由美國傳入日本的歷史看來，尤其在「電視普及之前」某項運動若要廣泛傳播，需要三大要素。首先，「僑民」（外籍商人、教師、傳教士與軍隊）要熱衷該運動，才有助於引起當地人的注意與學習。其次，「當地人」（尤其是菁英階層）須對該運動的成就心生嚮往。最後，「觀眾」相信自己的同胞有能力參與外國進口的運動項目，更因可能超越原發明國度而全國振奮（張美惠，2008：82）。民族認同與國家榮耀彼此接合的結果，使得國際競賽顯得舉足輕重，在比賽中獲勝成了國家和政治尊嚴的重要表徵，代表運動競賽具體反映出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張美惠，2008）。由此觀之，文明競爭與國族榮耀，成就了現代棒球運動傳佈日本的核心力量，加上現代媒體的傳播進行廣泛、深刻且有效率的國族形構，使得日本藉由國族競賽更快速地整合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Roden 在研究日本棒球風靡的原因，發現棒球能傳達日本社會最重視的價值觀——秩序、和諧、堅持、自制、團結，例如日本的棒球必須靠教練下達戰術、球員確實執行以求勝，規則上也設有和局制，雙方一團和氣，不需為了勝負爭得你死我活（Roden, 1980:519）。不過 Guttman 更傾向於認為棒球得以流行，是因為日本人相信棒球就像電報一樣、電話等新科技一樣，是日本邁向「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特徵之一；學習美國人的棒球，讓日本人重拾民族的自信（Guttman, 1994:76-78）。進而讓日本建構出屬於自身主體特色的「野球文化」。

例如在 1895 年，日本一高棒球隊的主將中馬庚首度創造出「野球」一詞。在此之前日本人都將美國傳來的 baseball 直譯為ベースボール，直至該年在撰寫一高隊隊史的過程中，中馬庚認為日本應有代表 baseball 的專有名詞，於是將 baseball 改譯為漢字「野球」（yakyu）。該詞最早出現的 1895 年也被後世稱為「野球元年」。從 baseball 到「野球」，證明棒運

已在日本生根、茁壯（謝仕淵、謝佳芬，2003：17）。日本的武士道棒球，發展至此，在內部精神、球場禮儀、作戰技術上已相互結合為一體。這項起源於美國的外來文化，因此經歷了本土化的歷程，具備了獨特的日本色彩（謝仕淵，2017：26）。值得注意的是，1895——「野球元年」，其實也就是日人征服臺灣的第一年，隨著日本軍人、官員的進駐，野球也悄悄地進入臺灣（謝仕淵、謝佳芬，2003：17）。

承上所述，Elias 就認為全球化的第三期，才真正讓各種競技性運動競賽傳佈全球而取得主導性的身體文化地位，因為這個時期的競技運動成為國家與國家之間彼此競逐的象徵再現（Elias, 1986a:40）。而在這段運動化（1870-1920）的進程裏，西方人，特別是英國人，是佔主導地位的運動選手（player），運動開始傳佈到歐洲、非洲、亞洲和南美洲。但是英國並不是這場賽局當中的唯一選手，丹麥、瑞典的體操，德國的體育協會活動（turnverein movement）以及丹麥的遊戲活動也都相繼傳入北美與世界不同國度，所有這些歷史過程都為全球運動發展的「歐洲化」（Europeanization）寫下例證，這一時期中，運動人員、形式、意識型態與形象的傳佈，反映了全球文化交換過程中的權力平衡與軌跡。不久以後，北美運動的人員、形式、意識型態和形象才開始與英國的現代運動競爭（Maguire, 1999:83-84）。甚至超越了英國成為現代運動發展過程中的新盟主。

最初，「國際競賽」大多以跨地區競賽的方式為國家或帝國統一而服務。英國的國際比賽就引導英倫島上的各民族或是大英帝國的不同部分之間相互競爭，並使之聯結成一個集團共同體。其中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帝國主義）的象徵可能是最重要的，可以建立一種共同的歸屬感。並從這些集體層面中發現、確認自己（Hobsbawn et al., 1983:301-302）。如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個國家之所以會張開雙臂歡迎某種運動，是基於該運動與國家內部的發展相一致，或是該國有意與此比賽的進口國（或殖民帝國）

一爭長短 (Nixon & Frey, 1996)。到了 19 世紀末期，國際間的交流變得越來越頻繁，國際競賽場數增加，國際的運動主管單位便趁勢而起。這樣的歷史情境也讓激進的國族主義崛起，並將文明競爭與國族認同的形構連結起來，極大地推進了運動文化全球化的發展。

直言之，現代棒球憑藉著「現代性」的動力，開啟了自身的全球之旅，從「英式跑柱式棒球」傳佈北美洲後轉型為「美國棒球」，並再跨越疆界形成「日本野球」（或加勒比海棒球），最後再接合殖民體制而形塑「臺灣國球」，建構起臺灣棒球的文明體驗，也架構起日後整合進入國際棒球體系的框架。

### 三、野球到臺灣——臺灣棒球的文明體驗

棒球的發展是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後，來到東亞。中國的棒球發展，一部分原因與「留美學生」將棒球帶回中國有關，例如日後對中國鐵道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詹天佑，便是在留學期間學會棒球，因此將棒球運動帶回中國。又或者學校與教會，如上海聖約翰書院與基督教青年會，也在中國推動棒球；這些教會與學校，多與美國有關。鄰近中國的韓國，棒球的發展也與基督教青年會的傳教事業有所關聯。與臺灣棒球息息相關的，則是棒球傳入日本（謝仕淵，2017：19）。

東亞社會在未經西方運動文明洗禮前，尚以「養生運動、禮樂運動、嬉戲運動和武術運動」等四種類型為主流的身體文化特色。到了 19 世紀末，中西文化大量交匯，中國社會面臨極大的轉變，體操教育（兵式體操）、體育（體育軍事化）和競技運動陸續自西洋和日本傳入中國，成為近代體育運動的主流形式，同時衝擊中國傳統體育的發展，連帶引發本土身體文化的危機意識和轉型呼籲（徐元民，2005：283）。「現代性的體驗」讓東

亞社會同時面臨外來殖民政經勢力與內在傳統制度轉型壓力的夾擊，興起「反現代性全球化」的土洋相爭與文化論辯。承續這樣的歷史發展脈絡，臺灣在 1895 年也因中國甲午戰敗而促使「脫亞入歐」的日本帝國相繼將其所新習得之現代運動帶進臺灣這塊殖民土地。

臺灣棒球運動開展於 20 世紀初期，距離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也不過數年光景，日本統治正逐漸穩定，在臺的日本公務員、會社職員、軍人、學生等，逐漸將母國從事的棒球運動引進臺灣。最初規模，並非正式比賽，也無關組織推動，主要目的為工作之餘的休閒，如公餘在臺北南門外，幾個年輕人在大空地上練習打擊；或者臺南北門外的山砲中隊軍人，利用餘暇時間在軍營中練習傳接球（謝仕淵，2017：34）。而臺灣史料記錄最早的棒球活動則是在 1897-98 年間，日本駐臺的「銀行行員」帶著棒球手套在臺北玩起傳接球的活動（蔡宗信，1992：15）。

棒球進一步發展，則從學校開始，1904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中學部（今建國中學），在田中敬一校長的支持下，購置球棒與手套，成立野球部。隨後國語學校師範部（今臺北師範大學）也成立棒球隊，兩隊於 1906 年三月比賽，為臺灣史上第一場利用正式比賽規則進行的棒球賽，創下臺灣棒球史的重要里程碑。隨後，學生幾乎都於官廳會社中任職的夜學校中學會，也成立棒球隊參與比賽，臺灣棒球的最初發展，便以這三個學校棒球隊作為主要架構（謝仕淵，2017；謝仕淵、謝佳芬，2003）。但初期這種「天皇的運動」，臺灣子弟無緣問津，加上反日情緒尚未平撫，社會動盪不安，臺灣人無心參與「日本鬼子的球戲」。直到日本對臺採懷柔政策與皇民化運動後，棒球才成為日本統治臺灣、安撫人心的工具之一（翁嘉明，1992）。

事實上，臺灣在日治時代前，並不具備現代運動的觀念與內容。是一個重文輕武、缺乏運動生活傳統的民族，到了日本接管臺灣以後，發生巨大的轉變。日本帝國開始在臺灣創制殖民系統，臺灣人的「新生活」被強



制設計形成。日本對西方文化採取徹底的模仿與移植，並把日本學到的那一套搬來臺灣。源於西方現代運動的各項競技運動就這樣陸續帶進臺灣。經由學校教育系統，不久後臺灣人便開始做「體操、舉辦運動會、打棒球、摔柔道，打劍道、網球」（陳柔縉，2005：212-15）。日本人將現代運動引入臺灣，目的是希望藉由運動推廣衛生、健康的概念，也藉機培養人民自由競爭與服從規定的精神。日本人既然將棒球視為現代文明的象徵，在臺灣推動棒球運動，也就成了日本宣傳殖民統治成效的工具（謝仕淵，謝佳芬，2003：18-20）。此時，學校體育身體文化則體現了忠君愛國、健身強國的原則。在殖民體制下，兵操的導入，軍人氣質的養成，甚至身體的檢查，衛生教育的重視，體力測驗的加強，遠足、運動會的舉辦等，無一不是為了雕塑足以適合世界競爭力的帝國臣民為前提（許義雄，2004：8）。

上述運動文明經驗的跨國流轉，象徵臺灣社會經由日本殖民教育制度的系統運作而逐漸確立現代運動的社會基礎。在這樣的歷史脈絡發展下，日本武士道棒球實踐也慢慢登上臺灣主流的運動舞台。如從日本和臺灣棒球史的脈絡來看，現代棒球成為兩國國球的理由顯然是一致的，構連著美日（霸權強制的開關通商）與日臺（殖民統治的時空條件）之間的文明競爭。就如同 Morris 所評論的：「日本棒球引進臺灣具有帝國主義（imperialism）和殖民主義（colonialism）的雙重意涵與作用」（Morris, 2006:5）。如再加上傳播媒體的高度渲染力與統合民族性的強大功能，都讓現代棒球成為國族認同的建構形式，在地社會並藉此進行「傳統的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因此可說，特定民族國家藉由運動所形構的文化認同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形成的，並呼應馬克思所言：「歷史是由人們所創造的，但並不是在自己能夠選擇的（物質）環境下所創造的。」

再由美、日、臺三方棒球歷史的接合過程看來，符合 Guttman 對現代運動的觀察：現代運動的傳佈是從殖民官員（行政人員、神職人員、教師、貿易商人、軍人）開始，都會區的上層階級通常是最早的文化接受者，

並形成接受與擴散的模式，這通常也與貿易和資本的流通有關（Guttman, 1994）。進而言之，運動全球化是歐美文化經由移民、殖民與文化模仿而擴張到世界各地的直接結果，繼而伸入文化和政治領域的支脈，在本質上也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型態密切關聯（Waters, 1995:3）。在這樣的脈絡下，吾人比較此一時期並存於臺灣社會的現代競技運動（如棒球）、傳統神道教系統下的身體活動（如武道）與軍國主義兵式體操之間的差異，就會發現，現代競技運動比其他活動顯露出更多的文化秀異性、遊戲娛樂性、身體競爭性與個人主義式的「民主」參與價值，並從「寓教於樂」的條件中創造出比武道和兵式體操更具有親和性的文化吸引力。

職是之故，臺灣社會也漸漸從殖民初期對現代運動所意涵的戰爭動員與軍事操演的誤解、以及輕視體能活動及恐懼棒球活動的粗魯意象中走出來（孟峻璋，2006：35）。進而提昇對新式運動的接受意願與普及程度。新式運動的推廣與建制，有助於民族國家推動國民日常生活精神與肉體的現代化，並能強化社會秩序的規範與生產效能，是建構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的穩定力量。現代運動更是一種「藉由運動進行身體改造」的媒介，透過制度化的運動實踐追求精神層次的道德要求（禁欲、公平競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行為準則（追求效率、講究致勝）。故此，現代競技運動的傳佈才會如此地快速，並被全球新興民族國家作為推進國家現代化的「身體政綱」與「教育政體」。

與此同時，除了學校棒球的發展之外，1910 年左右，隨著臺灣社會、政治逐漸穩定，由日本會社（即企業、公司、工廠之意）與「官廳」職員、「軍隊」軍人主導的「社會人棒球」也蓬勃發展起來，並逐漸將棒球傳播到臺灣各地（謝仕淵、謝佳芬，2003：26）。而至 1913-14 年之際，臺北已有十餘支棒球隊，包括臺北廳、殖產局、土木隊、法院等棒球隊，使得當時主要的棒球場—新公園，擠滿打棒球的人。最終，為了協調比賽制度、球場使用等問題，臺北棒球界希望能進一步整合，於是在 1915 年成立北

部野球協會（謝仕淵，2017：36）。

1910年代前後，殖民地臺灣的棒球發展，主要以「在臺日本人」為主，相對於日本內地以學生棒球為主要發展趨勢，臺灣由於日治初期中等學校體制尚未建立完整，本莊太一郎校長對棒球抱持禁止態度，校園棒球發展時而中斷，因此，初期便以「社會人棒球」為主，多半由在官廳會社等單位工作之在臺日本人，利用餘暇進行球賽，而學生從事棒球也被放在社會組的架構內進行（謝仕淵，2017：37-38）。各地的棒球發展，亦在此時常規化，北部野球協會成立後，南部野球協會、嘉義野球協會、基隆野球協會、臺南野球協會、高雄州野球協會相繼成立。球隊間有了明確的組織，讓棒球運動在常規體制中穩定的開展。不過，此時臺灣棒球的發展，既是日本人在異地中的鄉愁寄懷，也是殖民者優越感的憑藉（謝仕淵，2017：38）。雖然此時的棒球參與大多侷限於在臺日本人，但臺灣棒球仍然逐漸擴大整編運動隊伍、競賽規模與競技場地等多元條件，並以臺灣的北端都會區域為中心向中部、南部以及東部其他社會空間進行傳佈與發展。

### （一）「最初的少棒比賽」（1920）與「嘉農棒球隊」（1931）的甲子園傳奇

在展現臺灣棒球主體意志之前，誰是第一位打棒球的臺灣人這個問題就顯得有其意義。根據謝仕淵的考察，這個問題要到臺灣 1920 年代的歷史背景中探尋。1919 年，參加北部野球大會的醫專隊中，有兩名臺灣人參加；1924 年的高雄州野球協會第一回合爭霸戰中，鳳山隊也有一名臺灣選手。臺灣透過學校教育或者任職機關的原因，開始了接觸棒球的機會。尤其是在 1919 年，東神橡膠株式會社發明了較便宜、技術門檻低、安全性也較高的軟式棒球，棒球運動於是在 1920 年代更為普及，特別有助於少棒運動的廣泛開展。據報載，於 1920 年 12 月 5 日，臺南公園進行

一場由臺南市的第一小學校與橋仔頭小學校間的棒球賽，被稱為「臺灣最初的少棒比賽」。1921年新聞社則以創立二十週年紀念為名舉辦「臺北少年野球大會」，較具規模的少棒比賽正式在臺灣各州市揭開序幕。高雄市則為1923年開始；1924年臺中舉辦第一回大會，而臺東體協則在1926年成立當年舉辦第一回少年野球大會，花蓮港廳則在1930年舉辦第一回少年野球大會，這些少棒運動競賽初期則多由媒體主辦。嚴格說來，最初開始能夠以集體及大規模的方式接觸棒球的臺灣人，就是這群在1920年代就讀公學校的臺灣學生（謝仕淵，2017：46-51）。此一時期，正值日本對臺推行「同化政策」（1915~1936）。

到了1929年，由於1928年臺北與臺南兩地少棒對抗賽引起廣大迴響，由臺灣體育協會主辦的首屆全島少年野球大會揭開序幕。1929年8月3日，首屆全島少年野球大會，正是在新公園球場舉行。五支球隊依照臺北州旭小學、新竹州新竹小學、臺中州臺中小學、臺南州臺南小學、高雄州高雄一公參賽，與賽的各隊中只有高雄一公是臺灣人組成，其餘球隊都是日本人。比賽結果，高雄一公累積戰績三勝一和，得到冠軍，全隊凱旋高雄獲得熱烈歡迎，引發處於殖民地位的臺灣人有能力與殖民者一爭高下的媒體論爭與象徵意涵（謝仕淵，2017：53-56）。

高雄一公作為臺灣漢人與日本人競逐高下的初始象徵，而花蓮能高團則是原住民參與棒球的關鍵起點。這群從事棒球運動的原住民，被認為是「改正蕃人傳統的特有兇暴性，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這正是花蓮港廳長江口良三與商界聞人野梅清太致力於推動籌組花蓮原住民棒球隊的原因。1925年7月，能高團訪問日本，一共在東京、橫濱、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等地，進行了九場比賽，成績為四勝四負一和。能高團在比賽中展現了驚人的跑壘與強大的臂力，並展現運動家精神，贏得日本球迷的肯定。這與江口良三和野梅清太擘劃發展產業，甚至要廣召日本移民，同時致力於宣傳東臺灣的優勢，鼓勵人口移入與資本投資的宗旨符合。在此

背景下，能高團的勝利被視為成功教化野蠻的原住民，具有宣傳東臺灣為開發沃土的效用（謝仕淵，2017：58-62）。

除了校園棒球的發展之外，軟式棒球的發明與普及也開啟大眾棒球的時代。其中，軟式棒球賽被認為是受薪階級業餘從事的運動，具有運動健身與聯絡交誼的性質，參與者多為會社員、教師、公務員，在城市的普及率高於鄉下，跟高度專業化，並且以全島、全國性比賽為目標的比賽用硬式棒球，有顯著的不同。大約在 1928 年，臺灣各地開始舉行以區域為單位的軟式棒球賽，例如 1928 年有臺北大會，而光是 1929 年當年，便有臺南大會、屏東大會、蘭陽大會、新竹州軟式大會、嘉義市制祝賀大會、花蓮港大會、基隆大會、斗六大會等比賽舉行。到了 1930 年後，臺灣從南到北相繼成立專門推動軟式棒球賽的軟式野球協會。軟式棒球的普及與價值，跟為國族榮耀而戰者，如嘉農、紅葉和金龍等有別。日治時期日漸普及的軟式棒球，為人群互動產生了一種新連結，也成為社會文化的新焦點，甚至反映生活文化品味，成為區辨社會階級的象徵（謝仕淵，2017：70-74）。

1931 年，由臺灣人組成的「高砂野球聯盟」成立了，並在當年度舉行了兩次比賽，與賽隊伍一度高達八支球隊。高砂野球聯盟成立的原因不明，但從聯盟中「一公俱樂部」（隊員以高雄第一公學校畢業生為主）隊員，包括 1929 年為高雄第一公學校得到全臺灣冠軍的大功臣，但畢業後卻未進入日本會社與官廳上班的許炎，以及蕭長滾先生口述：「沒有球可打，臺灣人就自己組隊比賽」的說法（謝仕淵，2017：44）。上述史實透露出，「高砂野球聯盟」是在地臺灣人初步在棒球場域內所展現的主體性，以及臺灣南部發展其棒球愛好的具體體現。

1931 年「嘉農棒球隊」的甲子園傳奇，則是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上值得一書的大事件。自 1923 年臺灣開始參加甲子園以來，贏得代表隊的球隊，清一色皆為日本人組成。直到 1931 年，嘉農取得代表權，隊中包

括臺灣的漢人、原住民與日本人等三民族，為臺灣人登上甲子園舞台之始。嘉農的精采表現，點燃了臺灣人對棒球的熱情。在殖民時期，能夠因為棒球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站上汽車遊街，接受眾人歡呼，是臺灣棒球夢的起點。但，強化嘉農三民族合作的成功，其實是在頌揚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是三民族的共同成就（謝仕淵，2017：85-88），這是同化政策（內地延長主義）的有利樣板，更是後續皇民化政策（1937-1945）的有利基礎。張力也曾將日治時期現代棒球在臺灣傳佈的過程劃分為：帝國階級秀異、國民教育同化、文明的仿同/抵抗與軍事體鍊等四個階段（張力可，2000），描述了臺灣初期承接日本野球文化的生成背景與轉折過程。

上述的現象說明了，在運動化的第四期（1920-1960），屬於美式的競技運動精神獲得了優勢主導的位置。就像 Quanz 所下的評論：「美國的理想取代了英式的典範」。全球開始模仿美國在體育、運動和奧運會上的成功經驗。諸如在教育學和社會系統下所進行的公園和遊戲場（playground）的整建運動，以及將理論和科學取向的運動視為整個身體教育的概念（Maguire, 1999:84）。臺灣則因日本殖民系統銜接上運動世界的「美國夢」（American Dream），逐漸接合進入全球棒球運動體系，當然也產製出混雜美日棒球特色的「臺灣國球文化」。歷史留下的痕跡也說明了，運動全球化的進程並不會完全扼殺個別國家的概念與民族的認同，運動場域更成為各種文化差異與認同政治的展演與爭霸之地，如同戰後臺灣棒球與籃球之間所劃出的族群政治。

## （二）戰後國民政府主導下的臺灣棒球

戰後臺灣棒球運動的發展，因國民政府的主導而有其不同的轉變。研究臺灣棒球歷史的 Morris 就在〈臺灣棒球與全球化的臺灣認同〉一文中說明：臺灣是在二戰後開始涉入全球化，臺灣棒球也發展為一種通往全球化、使國際接納的狀況；同時也通向一個在地的、特殊的臺灣性

(Taiwanese) 認同的路徑。Morris 強調，日本以殖民地迷思的方式，透過日本的國家儀式，顯示臺灣人（包括漢人和原住民）願意並有能力可以參與為、依傍為日本人。但臺灣人在棒球（日本國技）上的優異表現，也使得日本人必須對臺灣人的能力作某種不得不的認可。臺灣棒球因為日本殖民的關係，形成一種獨特的臺灣性質，使戰後的國民政府無法將棒球操弄成「中國人的」慣常行為。棒球對臺灣人而言，成為可以對國民黨「去臺灣化」(de-Taiwanization) 政策的一種反彈。針對臺灣棒球運動所位處的多元認同矩陣，Morris 認為對當時的臺灣人而言則可達成許多目的：(1) 做為對美國霸權的一種平衡；(2) 走上一條親日的懷舊和必要的中國認同之間的小徑；(3) 透過棒球場域的意義表現原住民部落的力量和榮耀。故此，棒球在臺灣形成一種對日本的懷舊情緒、臺灣人對國民黨霸權的抵抗、對美國在東亞布建霸權的抵抗，以及原住民對（本省、外省）漢人壓迫的抵抗等複雜的認同情結（張力可，2000：24-5）。

此一族群與運動的分野有其歷史事實的支持。二戰後，國民政府播遷來臺，此時基於上海、天津所傳承的籃運輝煌史蹟（吳文忠，1997：342）。加上政府公營單位與外省私營企業的支撐，籃運開始在臺灣開出一片天。然而棒球在戰後的發展卻因與 1949 年的國民政府無「法統」的承接關係，尤其臺灣棒球的實踐脈絡也充滿日式文化的痕跡，所以棒運自然受到排拒與漠視（晏山農，1992：35）。

就如同媒體所指稱的，戰後初期「本省人的愛好棒球，一如外省人的愛好籃球」，展現族群地理與運動版圖的相互堆疊樣貌。加上戰後政經資源以外省族群占優勢，使得棒球與籃球不僅具有本省與外省的分野，也有官方與民間認同的差別。如以場館設備為例，1949 年以後，先後興建鄭州路球場、憲四團球場，為籃球比賽提供更良善的物質空間。1950 年，憲四團球場首見夜間照明，為臺灣籃球夜間比賽之始。1951 年，五千多人的三軍球場，以及此後的兒童公園體育館、中華體育館的興建，都可以

看出籃球運動受到當局重視的程度。70 年代之後，籃球與棒球這條運動族群的邊界才有所鬆動（謝仕淵，2017：142-145）。

揆諸臺灣戰後棒球史，鬆動這條邊界的具體理由才會顯現出來。例如，1968 年紅葉少棒戰勝日本關西聯隊，產製出臺灣史上的「紅葉傳奇」；1974 年的少棒、青少棒、青棒國際賽揚威，則留下了「三冠王」的歷史神話。世界冠軍的榮銜，使得國家宣傳機器轉向棒球，意圖將棒球形塑成社會凝聚與奮鬥團結的國族奇觀與集體認同。荷蘭文化史學家就曾表示：「國家要尋求它存在的理由時，就會發現這個理由是存在於一個民族的優秀文化裡（Huizinga, 1949）」<sup>9</sup>。所以，現代國家才會利用媒體的再現策略（representational strategies）來建構國家共同的歸屬感（Maguire, 1999:178），這是因為運動在具有戲劇效果又有激情的同時，又能保持政治上的無爭和微不足道。運動具有爭強好勝的特性，使其完全適合在運動中激發愛國主義（Herman & McChesney, 1997）。故此，以國家為單位的國際競賽，演變至今已經成為一種「愛國競賽」（patriot game）的展演形式。

而在運動文化爭霸的脈絡下，利用運動在「國際共同體」贏得聲譽，則是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的特色，許多國家極力在等級制度中尋求自身晉級世界階級的地位。運動代表了爭取地位的時機。隨著國家發展，他們被誘發要向世界各國展現其政治、經濟的實力，並由公民團體所管理的社會機構中，證明自己的公民已經達到可接受的生活水平。這些國家更渴望被承認是國際舞台上擔負重任的角色。換句話說，就是「希望獲得關注並接納為國際共同體中，一個正式而平等的成員」（Nixon & Frey, 1996:277-278）。由此觀之，運動顯然不僅只是國族政治的競技場域，更是族群政治的鬥爭場域。

尤其，臺灣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後，引發國際地位與政經局勢的變遷，促使臺灣業餘運動組織皆在 1973 年進行名稱上的改制。到了 1978



年「中美斷交」，臺灣在國際奧會的席次則因國際情勢的轉變而讓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經過國際政治的權力折衝而在 1981 年創制「中華臺北」(Chinese Taipei) 參與國際賽會的「奧會模式」，這是運動場域反映出國際強權政治的互動結果。時至 21 世紀，2008 年在北京奧運，「中國 / 中華臺北」依然是展演兩岸政治角力與國家認同賽局的權力競技場。反觀臺灣運動場域的現實發展，即便籃球運動的普及程度遠超越棒球運動，但基於意識型態與國家榮耀的張揚，棒球這個在國際上比較常贏球的項目，還是超越了籃球而被賦予「國球」的稱號。一如林琪雯及 Morris 所評論：戰後臺灣棒球的實踐與國家政權的維繫緊扣相連 (林琪雯, 1995; Morris, 2006:12)。

上述臺灣籃球及棒球運動的發展，具體說明了現代運動的傳佈與發展並無法只靠少數人為的力量就可以主控最後的結果，而是歷經各種多元條件、歷史過程以及權力互動後所遺留下來的暫定「後果」。臺灣棒球與籃球運動的演變，說明了現代運動的發生、成長、勃興、衰落以及後續復興的社會過程，是凝聚了各種政經資源、統治者偏好以及民族優勢想像等複雜的權力運作網絡。對西方而言，逐漸步向「文明化」的進程是運動從傳統轉型成為現代的主要特徵。但對東方社會而言，現代棒球象徵了西方文明價值，而非由自身的土地創造出來的身體文化與社會傳統。以此觀之，從西方社會流轉進入臺灣的各種現代運動文明，連帶地讓地方性的「身體文化」逐漸流失過往的價值。

反觀 1960 年代後期的全球運動場域，權力平衡的變動更現劇烈。媒體運動產製複合體開始大力行銷「相同的商品」(特別是美國的運動形式)，而管控全球流動的政治經濟體系則不斷確保地方社群無法自由選擇所欲消費的文化產品 (Maguire et al., 2002:12-13)。Nixon 和 Frey 認為這樣的現象意味著，運動在國際關係上所飾演的矛盾角色是：一方面運動提高民族主義與國際瞭解；另一方面，它又是製造文化依賴的工具。在這個

過程中，本土的身體文化表現，逐漸被現代制度化、商業化與菁英化的運動所取代（Nixon & Frey, 1996:281）。這樣的發展脈絡與全球化第五階段的「不確定期」有所重合，這時期包括透過太空科技（衛星電視等）進行播送的全球大眾傳播媒體，全球範圍的溝通與媒體系統加速整合；第三世界去殖民化、冷戰結束；促使全球性的組織和社會運動大量增加，立基於性偏好、性別、民族和種族的世界社群；個體的概念在性別、種族等議題上獲得重視，民權成為全球性的議題；國際性的系統流動日益深化，帶來複雜且高密度的全球化時代以及更複雜且易變的國際關係（Robertson, 1992:60）。並於 90 年代開啟媒體科技與商業資本合體運作下的臺灣職棒運動。

### （三）商業資本與媒體科技合體運作下的臺灣職棒運動

事實上，臺灣棒球是在 60 年代經由愛國競賽和媒體傳播的結盟後，才逐漸拉開 70、80 年代的臺灣棒球興盛史。1990 年代初則迎來新的發展，棒球在具備深厚的社會基礎並成功地「普及化」，再歷經「媒體化」、「商業化」並進入「職業化」的里程碑後，更加迅速地和全球運動體系與跨國消費市場接合起來，繼而產生更為強大而持久的影響力與交互依賴性。此一新型態的核心發展模式則是以商業資本與媒體科技的雙重擴張，開展出臺灣棒球的新面貌，其中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則來自於日、美兩國具主導支配性的外緣力量。

例如，20 世紀晚期，北美運動投資者開始拓展視野，開發北美以外運動投資的可能性。這種擴張，與「多國企業」的發展模式相仿，都把市場延伸到全世界，以追求更高的利潤。北美主要運動聯盟試圖以下列數種方式擴張至全球市場：(1)利用衛星和有線電視頻道轉播美國運動到亞洲和歐洲，不斷嘗試擴大全球的球迷版圖；(2)提高聯盟與球隊商標的知名度，進而大量販售球隊授權商品，如將印有球隊標誌的衣服、帽子在全球

範圍內販售；(3)運動衣飾及球鞋零售的全球行銷；(4)在北美地區以外進行 NFL、NBA、NHL、MLB 的開幕戰或例行賽，藉此擴大全球影響力，讓美國的職業運動在全球運動市場獨佔鰲頭；(5)對跨國的職業運動隊伍進行贊助。直到 1990 年代，眼見美式足球、籃球、曲棍球在國際間發展得很成功，「美國棒球」才開始嘗試推廣棒球到海外（張美惠，2008；Horne, Tomlinson & Whannel, 1999；Nixon & Frey, 1996），並將主要市場鎖定在亞洲與拉丁美洲市場（Bellamy, 1998）。

職業運動的全球性擴張，促使商業運動、電視媒體和商業的伙伴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不斷成長，大型企業和職業運動組織則在運動的全球性擴張中扮演著共生的關係（Maguire, 1990）。Whitson 則在〈促銷的迴路：媒體、行銷與運動全球化〉一文中說明，早在 1990 代年北美四大運動聯盟就發展出許多策略，去行銷他們的產品給全球的閱聽大眾，包括電視套裝節目（telecast packages）和授權商品（licensed merchandise），當全球範圍內的觀眾收看美國職業棒球時，MLB 的比賽就能變成行銷全球商品的有力工具。而運動名人（celebrity）、職業運動團隊（professional sport）、跨國運動企業（corporation）以及媒體組織（media）則連結成一個「促銷的迴路」，彼此不斷強化對方的品牌形象與企業價值，並從中獲取全球性的市場利益（Whitson, 1998:57-72）。

面對美北職業棒球的擴張，全球 / 在地的互動顯露出彼此糾結與交錯影響的具體後果。尤其從 1990 年臺灣職棒成立起，在地運動與全球運動體系的交流更加頻繁快速。而王建民 2005 年初登大聯盟後，更成就「王建民現象」這個由全球/在地互動依賴系統所激發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邱建章，2011），此一個案讓運動移民、媒體影像、運動產業，皆因全球 / 在地認同的牽引而加速邊陲化的依賴困境。在地社會的真實境況則為：美國正以其強大的「軟實力」（soft power）（如由 FOX、MLB、NIKE 結盟而成的媒體運動產製複合體），造就一個新興的運動文化帝國，

加速全球運動體系的流動。

其中包含：(1)現代運動匯聚為在地社會的主流運動文化與生存心態（在地社會充斥現代美式運動實踐，而傳統身體運動文化則衰微不振）（邱建章，2012b）；(2)運動菁英外流呈現「文化勞動新國際分工」（大量棒球菁英外流美國，在地社會幾近淪為棒球核心國家的球員農場）（邱建章，2011；劉昌德，2008；何哲欣，2006）；(3)一個以「媒體/西方」為中心的運動全球化（美式運動影像充斥在地社會，形成不平衡的媒體消費）（劉昌德，2003；鄭安翔，2001）；(4)位處世界一半邊陲體系內的臺商代工廠（臺灣淪為全球品牌的代工廠與消費者，絕大部分的在地品牌難以匹敵）（邱建章，2012a；Goldman & Papson, 1998:9）等四個層面的不平衡流動。

承上所述，面對現代棒球傳佈與接合進程逐漸「美國化」（Americanization）且非「利大於弊」的現實發展，進而激起在地運動的批判性反思，意圖應對由此衍生而出的文化與經濟問題。

#### 四、結語：現代棒球的傳佈與接合——在地運動的批判性反思

初步完成現代棒球跨國傳佈的歷史社會學詮釋後，對於在地社會運動文化而言，這個進程既是東方與西方之爭、也是傳統與現代之變。現代棒球跨國傳佈的不同時期與社會進程中，多元因素主導著變遷的軌跡，此一脈絡秩序下，特定人員與組織機構的推力與加強因素也逐漸浮現。其中，現代棒球的運動化進程，是各種有意圖的意識型態實踐和非計畫性的相互依賴關係之間的平衡或調合所建構而成的「暫定後果」。在這個不平衡的接合過程中，支配與從屬的結構從未消失，壓制與抵抗的緊張關係不時顯現。以下則以文化全球化的五階段來簡要說明特定時空區位、人員活動與

組織機構在現代棒球傳佈與接合中的角色與作用：

### (一) 第一階段 1400-1750 年代的「萌芽期」

早期「棒球」的歷史充分反映歐陸移民跨越大西洋「移居」新大陸時，將英國本土原生的跑柱式棒球於 17 世紀帶入「美洲殖民地」。跑柱式棒球隨著「愛爾蘭移民」而在「北美東部」落地生根，並隨時間與「文化混雜」的因素而發展出與原生地不同的美式棒球文化。往後，現代棒球的跨國傳佈與美國的地緣政治與殖民疆界高度重疊。

### (二) 第二階段 1750-1870 年代的「開端期」

1800 年代早期「跑柱式棒球」在北美東部獲得歡迎，卡萊特則在 1846 年制定日後公認的「業餘」棒球制度，「現代棒球」始於紐約市創設——「燈籠褲棒球俱樂部」。1860 年代棒球運動隨「南北戰爭」的「軍員遷移」而造成風潮，進而在 1871 年開展出美國「職業」棒球聯盟。此一時段，制度化是現代棒球興盛的關鍵機制，棒球運動開始藉著理性化管理的官僚體系展開「文明化」與普及化的過程，更歷經了「貴族紳士型運動俱樂部」轉型為「大眾平民型運動協會」以及「資本營利型職棒組織」的變遷。這段歷史進程顯露出族群移民、階級分野、性別差異、平等參與、工業化、理性化、都市化、資本獲利等元素，已緊密地與現代棒球的發展鑲嵌在一起，難分難捨。

### (三) 第三階段 1870-1920 年代的「成長期」

國際運動組織與 1896 年「現代奧運的復興」，是此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運動事件。19 世紀後半段，棒球運動繼續跨越國界擴張傳佈至太平洋另一邊的亞洲後進國（1864 年加勒比海古巴棒球是另一組重要的傳佈路徑），我們跟著山姆大叔走，也就找到現棒球跨國傳佈的關鍵力量：殖民

現代性。如 1853 年美國船艦讓日本拉開「開關務洋」的時代，棒球於是跟著「黑船」開進日本。1873 年美籍教師將棒球運動教給日本學生，打開日本棒球體驗的新頁，而當日本逐漸開展出野球風格時，1895「野球元年」正是日本統治臺灣的第一年，「武士道野球」跟著殖民體制登陸臺灣，開啟棒球文明的初體驗。日臺兩國都在此一階段捲入帝國的殖民勢力，挪用現代棒球作為國族競爭的工具，並作為一種推進國家現代化的「身體政綱」與「教育政體」。

#### (四) 第四階段 1920-1960 年代兩次世界大戰間的「霸權爭鬥期」

美式的競技運動在全球取得優勢主導的位置，現代棒球被各方行動者加以挪用、「戲仿」(mimicry)、乃至顛覆的力量。早期棒球場域是日本人的主場，臺灣人大規模參與棒球運動是以 1920 年「臺南」舉行的「最初少棒比賽」為起點，「嘉農棒球」則在 1931 年創造出進軍日本的「甲子園傳奇」。可以說，日治時期臺灣棒球經歷了帝國階級秀異、國民教育同化、文明的仿同 / 抵抗與軍事體鍊等四個階段。如以英國、美國、日本再到臺灣這個現代棒球的傳佈路徑來看，這個「運動化」的歷史圖像尚在演化、並未止息。如 Elias 所言：運動這個藉由人與人或集體與集體之間所形成的相互依賴與權力平衡網絡，有著不斷延續與變遷的可能性 (Elias, 1994)。就像充滿不確定性的激烈賽局，在場球員都想利用優勢走向逆轉勝利。值得一提的是，外籍僑民 (外籍商人、殖民官僚、教師、傳教士、軍員)、在地菁英 (上層菁英與棒球英雄) 與廣大的愛國觀眾共同演出「愛國競賽」的文化奇觀，並成為現代棒球接合在地社會的關鍵角色，展演從「菁英向平民影響」、「中心向邊緣擴散」以及「都市往鄉村傳佈」的棒球文化圖像。更是一場「美國人、在臺日人、漢人、原住民族群、國民黨政府」彼此競爭、融合、戲仿而成的棒球遊戲。

### (五)1960 年代以來的「不確定期」

運動全球化的進程顯示出西方身體文化本身不間斷地遭受諸如性別、種族、階級、失能者等社會群體的爭論、再詮釋所帶來的改變(Maguire, 1999:76-77)。國民政府主導下的臺灣棒球，則經歷了 50、60 年代由籃球與棒球實踐所劃界出的「族群政治」。70、80 年代風雨飄搖的國際情勢則讓經常贏球的棒球獲得「國球」的封號。1990 年「中華職棒聯盟」的創立則象徵商業資本與媒體科技藉由棒球運動進行雙軌擴張，開展出越來越多彼此依賴、交互影響的不確定因素。尤其，2005 年「王建民現象」更加速臺灣社會接合進入「全球運動體系」(global sport system)，在地社會面臨運動文化逐漸「美國化」且「弊大於利」的不平衡發展，須以批判性的視野應對由此衍生的問題。

故此，可視「運動全球化」為一個基於現代傳播通訊與交通運輸科技的發展，加速空間與時間不斷壓縮的社會過程；導致各種與運動相關的人員、科技、金融資本、商品、媒體影像、意識型態與生活方式逐漸傳佈、交織在廣闊的全球之流，形塑出一個地方性事件深受遠距事件影響的運動世界。早期運動化的發展，是隨著西方殖民體系中的軍隊、傳教士、商人與教師等媒介進行傳佈，當代運動化則以「媒體科技」為運作軸線，整合了國際運動組織、跨國企業與全球媒體機構；各種權力幾何網絡與社會制度以各自所需的邏輯強化運動全球化的過程，創造一個並非平衡發展的「全球運動體系」(邱建章，2009)。

現代棒球承載著現代性的諸種因素與趨力，演化為高度世俗化的身體實踐、重視平等參與的資格與運動競技的專業化程度、並由科層體制治理全球一體化的運動機構、而合理化與理性化則成為規範身體活動及提高運動表現的科學根據及理論基礎，尤其，對於量化和紀錄的熱烈追求，則是資本主義文化邏輯的具體體現。其中，現代棒球早期原是西方白人男性菁

英的意識形態與身體品味，因不斷加入不同的參與者而產生不同的主導力量與發展方向。例如，藍領工人加入賽局，白領菁英必須和其分享這項刺激愉快的身體競爭，職業運動更強勢壓倒業餘精神，讓有天賦的運動員有機會打破扭曲的階級結構而嶄露頭角，東方社會因殖民體制而加入棒球賽局，西方人也就無法獨佔這座競技場地，甚至常有振奮人心的逆轉勝利。運動場域從霸權的高度宰制轉變成具有協商、戲仿與抗拒的文化空間。

現代棒球的歷史進程也表示，運動可以是強者對他者進行壓迫或秀異的工具，也可以是弱者反抗並建構主體認同價值的武器。如要嚴肅思考創造在地運動的主體價值，就應當創造一個更加民主化且對在地社群更有意義的運動實踐，一種打破國族意識形態、競技主義至上、族群政治、年齡歧視、性別壓迫、階級差格或金錢支配的新型態運動文化，支持每位「他者」都能「共享」的運動世界。尤其，面臨全球化的挑戰，更需要建構以臺灣這塊土地為對象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深入瞭解本土的種種特質與處境，並以臺灣做為行動的場所，藉以回應全球運動的挑戰，發展出具有在地特性的運動制度，形成具有能動性(agency)的行動策略，直面這個「弊大於利」的現實問題。

## 引用文獻

- 王志弘、李根芳(譯)(2003)。《文化理論詞彙》。臺北市：巨流。(Brooker, P., 1999)
- 何哲欣(2006)。《留我不留？談全球化浪潮之下臺灣棒球人才外流的現象》(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邱建章(2007)。〈運動身體與東方主義——以業餘精神的歷史流變為中心〉。《身體文化學報》，4，77-108。



- 邱建章 (2009)。《運動全球化對在地運動主體價值的衝擊與回應》(未出版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邱建章 (2011)。〈運動員「明星化」的現象：王建民與臺灣之子〉。《運動文化研究》，16，33-96。
- 邱建章 (2012a)。〈運動品牌全球化發展的文化反思〉。《身體文化學報》，14，147-208。
- 邱建章 (2012b)。〈運動與全球化〉。載於黃東治(總校閱)，《新編運動社會學》(頁 1-32)。臺中：華格那。
- 林琪雯 (1995)。《運動與政權維繫——解讀戰後臺灣棒球發展史》(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臺北市。
- 孟峻璋 (2006)。〈衝突與接納——解析日治時期引進棒球運動之過程變遷〉。《臺灣史料研究》，28，49-66。
- 吳文忠 (1997)。《體育史》。臺北市：正中。
- 徐元民 (2005)。《體育史》。臺北市：品度。
- 翁嘉明 (1992)。〈棒球的美麗與哀愁——民心變遷下的臺灣棒史〉。《中國論壇》，32(12)，27-31。
- 晏山農 (1992)。〈新認同的配方——臺灣棒運的「力脫死」及其顛覆〉。《中國論壇》，32(12)，32-36。
- 許義雄 (2004)。〈臺灣百年身體運動文化建構〉。載於許義雄等著，《運動文化與運動教育》(頁 1-20)。臺北市：師大書苑。
- 陳柔縉 (2005)。《臺灣西方文明初體驗》。臺北市：麥田。
- 張美惠 (譯) (2008)。《瘋足球，迷棒球——職業運動經濟學》。臺北市：時報。(Szymanski, S. & Zimbalist, A., 2006)
- 張力可 (2000)。《臺灣棒球與認同——一個運動社會學的分析》(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
- 鄭安翔 (2001)。《有線電視體育新聞內容與產製分析——以「年代體育

- 台」、「東森育樂台」、「緯來體育台」三家準專業頻道為例》(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新北市。
- 蔡宗信(1992)。《日據時期臺灣棒球運動發展過程之研究——以1895(明治28年)至1926(大正15年)為中心》(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劉昌德(2003)。〈「西方宰制、媒體中心」的運動全球化〉。《傳播文化》，10，69-96。
- 劉昌德(2008)。〈帝國搖旗，國族吶喊：棒球勞動國際分工與運動國族論述之轉變〉。《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0，33-77。
- 謝仕淵、謝佳芬(2003)。《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市：果實。
- 謝仕淵(2017)。《臺灣棒球一百年》(新版)。臺北市：玉山社。
- 羅潯德(2012)。〈拉丁美洲的瓜分：運動競賽與帝國競賽〉。載於皮耶·森加拉維路、朱利安·索海(編)，《運動帝國：文化全球化的史記》(頁147-160)。臺北市：河中。(Arbena, J. L., 2010)
- 臺灣棒球維基館，〈棒球〉，2018年10月15日，取自〈<http://twbsball.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6%A3%92%E7%90%83>〉。
- Bellamy, R. V. (1998). The evolving television sport marketplace. In L. A. Wenner (ed.), *Mediasport* (pp.73-87). London: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Elias, N. (1986a). Introduction. In N. Elias & E. Cunnig (Eds),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s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pp.19-62). Oxford: Blackwell.
- Elias, N. (1986b). The genesis of sport as a sociological problem. In N. Elias & E. Cunnig (Eds),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s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pp.126-149). Oxford: Blackwell.

- Elias, N. & Cuning E. (1986). *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s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 Elias, N. (1991). *The society of individuals*. Oxford: Blackwell.
- Elias, N. (1994).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 Blackwell.
- Goldman, R. & Papson, S. (1998). *Nike culture*. London: Sage.
- Guttman, A. (1978). *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uttman, A. (1994). *Games and empires: modern sport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Herman, E. S. & McChesney, R. W. (1997). *The global media: the new missionaries of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Cassell.
- Hobsbawn, E., Cannadine, D., S. Cohn, S., Morgan, P., Ranger, T., & Trevor-Roper, H.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rne, J. (1998). The politics of sports and leisure in Japan : global power and local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Sociology of Sport*, 33(2), 171-182.
- Horne, J., Tomlinson, A. & Whannel, G. (1999). *Understanding spor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ical and cultural analysis of sport*. New York: E & FN SPON.
- Huizinga, J. (1949).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Jarvie, G. & Maguire, J. (1994). *Sport and leisure in social thought*. London: Routledge.
- Klein, A. (1991). *Sugarball: the American game, the Dominican drea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guire, J. (1990). More than a sporting touchdown: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otball in Britain 1982-1989,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7, 213-237.
- Maguire, J. (1999). *Global sport: identities, societies,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guire, J. (2000). Sport and globalization. In J. Coakley & E. Dunning (Eds.), *Handbook of sports studies* (pp.356-369). London: Sage.
- Maguire, J., Jarvie, G., Mansfield, L. & Bradley, J. (2002). *Sport worlds*. Champaign, IL: Human Kinetics.
- Morris, A. D. (2006). Savages, traitors, budweiser, and a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and baseball in Taiwan. *Taiwan Historical Materials Studies*, 28, 2-31.
- Nixon II, H. L. & Frey, J. H. (1996). *A sociology of sport*.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Roden, D. (1980). Baseball and the quest for national dignity in meiji Japa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3), 511-534.
- Smart, B. (2005). *The sport star: modern sport and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sporting celebrity*. London: Sage.
- Whitson, D. (1998). Circuits of promotion: media, marketing and globalization of sport. In L. A. Wenner (Ed.), *Mediasport* (pp.57-72). London: Routledge.
- Waters, M. (1995). *Globalization*. London: Sage.